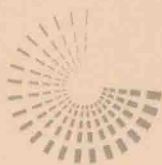


人民日报学术文库



张万杰 著

救亡图存东北魂

——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

JiuWang TuCun DongBeiHun

人民日报出版社



张万杰 著

救亡图存东北魂

——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

JiuWang TuCun DongBeiHun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 /

张万杰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 12

ISBN 978-7-5115-2271-9

I. ①救… II. ①张… III. ①抗日救国—研究—东北地区②西安事变—研究 IV. ①K265.907②K26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0422 号

书 名：救亡图存东北魂：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研究

著 者：张万杰

出版人：董

责任编辑：陈

封面设计：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846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3105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287千字

印 张：17

印 次：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2271-9

定 价：49.00元

自序

白山黑水,救亡群英;魂系东北,丹心汉卿。追寻着流亡群体的足迹,记述着救亡图存的历史。辗转南北,失不了东北汉子的血性;关里关外,改不掉东北老家的乡音。魂牵梦绕的故土东北,成为救亡群体日夜期盼的千里月圆。进谏忠言,“三位一体”结成西北统战联盟;推波助澜,齐心戮力加速联共抗日征程。东北西北,复土还乡雄心未泯;西安事变,救亡图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沦陷的家乡,他们誓言:东北,我可爱的家园,绝不允许豺狼践踏!东北,我可爱的疆土,绝不允许倭寇玷污!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以我血溅轩辕!翻开尘封的历史,东北救亡群体救亡图存之历程就是一篇英雄史诗,是一曲壮烈东北魂的精彩阐述!

高崇民在《东北魂》中写道:“在九·一八前,东北之魂未易言,而在九·一八后,东北之魂显可见。盖在前者虽欲形成而不可得,在后者虽不欲形成亦不可得。东北有魂,东北不亡。今后东北失之愈久,东北之魂,将愈发挥而光大。换言之,东北收复之日,即中华民族复兴之时。或曰:东北之魂何所寄?曰:寄于知识分子有志之士,此种知识分子,有志之士,已蔚然而生,形成集团,此集团无以名之,名曰:东北魂。斯魂也,行将感动全国,为全国人民收复东北之前驱,全国动员以之感动世界,世界必予吾国人以奋斗之机会,东北之收复,要在不失机会而已。”可以说,“东北魂”是东北救亡群体孜孜不倦的爱国情怀,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是东北流亡民众威武不屈的行动指南,是奋斗不息打回老家去的指路明灯。

感动之余,不由得我掩卷思考,细说我的写作脉络,描述我的写作内容。

定义东北救亡群体,才能明确本文的主题。东北救亡群体为组织、领导东北救亡运动的东北籍爱国人士的总称,是领导东北救亡运动的中枢系统。东北救亡群体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民众一片抗日救亡的呼声中孕育而生的。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很快沦陷,包括东北军在内的东北各阶层民众被迫流亡入关,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饱受欺凌和歧视。他们虽然成分不同,政治信仰各异,但“收复东

北失地,打回老家去”的坚定信念日夜不息。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发起轰轰烈烈的东北救亡运动。按照参与人员的身份和地位,我将东北救亡群体分成三个层面细细道来。

第一层面是张学良的核心组成员、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他们大多是张学良的幕僚好友,是张学良的智囊团、核心组,并在其支持下开展东北救亡运动的东北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凭借父老乡情与故土之亲对张学良及东北军将士有效地开展工作。代表性的人物是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车向忱等。杜重远,是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幕后策划者,是东北军、西北军、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总设计师;高崇民,是东北军、西北军联合的直接牵线人,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与参与者之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立下汗马功劳;阎宝航,身兼数职,被张学良和蒋介石两方所器重,利用国民政府职务的便利条件广泛地开展东北救亡工作;卢广绩,是张学良信任的幕僚和参议,在西安事变期间和高崇民两人参与了重大机要和决策,为西安事变的善后处理、维护东北军的团结殚精竭虑;王化一是东北中学校长,王卓然是东北大学校长,他们遵照张学良的指示,在动荡的局势下,培养复土还乡干部,竭力维持着这两所东北流亡学校;“东北甘地”车向忱,到西安后以两元钱起家办起竞存小学,开展爱国主义和复土还乡的教育……故土乡情,同教同朋,组成了一股强大的抗日救亡力量,促使张学良的思想由内战向联共抗日转变,推动东北军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是西安事变爆发的促进性因素。

第二层面是东北军内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将领。面对东北军的现状,他们建议张学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参与策划和支持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活动。代表人物有马占山、李杜、王以哲,还有少壮派黄显声、高福源、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马占山,因在莫斯科得到了斯大林援助中国抗日的面允,是最早劝张学良要联苏抗日的东北军将领;李杜,一直寻找着东北军与苏联、与中共联合的路径,受张学良寻找共产党的委托,向张学良推荐了共产党员刘鼎前往西安,成为张学良身边的“红色高参”;王以哲,是张学良信任的心腹大将,作为东北军方面的代表参与洛川会谈和肤施会谈,参与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一系列活动;黄显声,坚决主张联共抗日,多次直谏张学良要联共抗日,为表明立场,甚至辞职隐居;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张学良身边的“三剑客”,作为张学良信任的心腹嫡系,他们参与东北军中联共抗日的重大事宜,孙铭九等人还参与了“临潼捉蒋”。东北军爱国将领是张学良敢于发动西安事变的主要依靠力量。

第三层面是从事东北救亡运动的东北籍共产党员。代表人物有刘澜波、苗淳

然、孙达生、宋黎、栗又文及张希尧、于炳然、于毅夫、陈先舟等人。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是共产党员在西安事变前后的行动指南。在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未形成之时，东北籍共产党员就寻找各种时机，做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思想转变的工作，广泛开展救亡活动。其中，刘澜波，是共产党在东北军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以黄显声秘书和刘多荃族弟的身份为掩护在东北军中开展工作，帮助和影响了黄显声、董道泉、吕正操、万毅、陈大章等一批爱国军官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孙达生，受江苏文委委派，经杜重远的介绍到达西北，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方面的信任，为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做出了不懈努力；宋黎，以东北大学学生代表身份到达西安，被张学良留在西安开展学生运动，是东北民众救亡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西安事变期间领导群众救亡运动声援西安事变；苗淳然，曾作为张学良方面的代表慰问绥远抗战官兵，西安事变后联络阎锡山、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竭力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此外，东北籍共产党员栗又文、于炳然、张希尧、于毅夫等人也为争取张学良联共抗日、为东北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东北籍共产党员卓有成效地开展统战工作，对张学良、东北军将领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了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及东北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这三个层面在抗日复土意识的基础上很快团结起来，联合一致，逐渐形成一个为收复东北老家而奋斗的东北救亡群体。他们强烈的抗日复土意识与救亡运动的实践，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历史作用主要概括为五个方面：

第一，东北救亡群体是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的最忠实谏言者。调往西北与红军交战的东北军屡屡受挫，兵败山倒，主帅张学良更陷入了深深的苦闷中。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及时召开了探讨东北军前途的“核心组会议”，劝说张学良走联共抗日道路。同时，东北军内的爱国将领李杜、马占山、王以哲，东北军少壮派黄显声、应德田、高福源、苗剑秋等人纷纷向张学良表达停止内战、联共（苏）抗日的迫切愿望。此时，东北籍的共产党员刘澜波、苗淳然、孙达生、宋黎等人也按照共产党的战略部署，通过不同渠道来到西安，直接或间接地做张学良思想转变的工作。这些因素交织于一起，终于促使张学良下定联共抗日的决心。肤施会谈的举行，标志着张学良思想的转变，是张学良带领所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转折点。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是西安事变爆发的最关键性因素。

第二,东北救亡群体是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直接推动者。高崇民、孙达生、刘澜波、栗又文、卢广绩等人团结一致,密切合作,既做张学良工作,又对东北军将领适时引导,为东北军将士指出一条联共抗日的“活路”。他们积极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在王曲军官训练团、东北学兵队、抗日同志会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加速了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思想发生转变,推动了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红军和东北军相互配合,友好互助,在西北战场上形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

第三,东北救亡群体是实现“西北大联合”的积极联络者与组织者。“西北大联合”的总设计师杜重远向张学良提出了东北军要联共、联西北军、联苏联的总设想,高崇民则受核心组的委托前往西安,做东北军、西北军的联合工作。同时,孙达生、栗又文、刘澜波等东北籍共产党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成立东北民众救亡会,将东北救亡运动与西北救亡运动相结合,使救亡运动在西北蓬勃地开展起来。这促使张学良、杨虎城实现团结合作,终于在西北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抗日大联盟,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

第四,东北救亡群体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直接参与者与支持者。在蒋介石对西北重新部署兵力后,处于这种紧急状态下,苗剑秋等劝谏张学良实施“扣蒋”行动,高崇民等帮助张学良积极策划,促使张学良下定“扣蒋”的决心。在西安事变中,东北军少壮派受命直接参与了“捉蒋”行动,是西安事变的历史见证者。事变后高崇民、卢广绩帮助张学良处理大量的善后事务,王卓然在舆论上公开支持张学良,并与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一起成立图存学会以响应西安事变。解方、苗淳然、金锡如、高福源等人被派往各地,寻求各方势力的支持。车向忱和宋黎等人则全力组织动员群众,拥护张学良与杨虎城的爱国主张,支持西安事变。东北救亡群体是拥护和支持西安事变的主力。

第五,东北救亡群体是西安事变后的全力维护者。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确立后,共产党员刘澜波、宋黎等遵照执行,在东北军与民众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和解释工作。王以哲以及杜重远、高崇民等人也赞成和平路线,力求维护东北军的团结。当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在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主战的东北军少壮派与主和的元老派发生了严重的分歧。为避免东北军的内乱,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做了大量的善后处理工作,竭力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为营救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东北军政人员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联络沟通,为营救张学良积极奔走。东北救亡总会全力支持张学思、黄显声等人开展营救工作。营救工作虽屡屡受挫,但彰显出东北救亡群体与张学良的深厚感情和浓浓的故土乡情。

东北救亡群体是在民族危亡之秋、国难深重之际形成的一个特殊的爱国群体,研读这段历史,心中敬意油然而生。在西安事变的前后,东北救亡群体是以张学良为灵魂人物,以东北军为核心开展东北救亡活动的。他们经常活动于东北军、西北军之间,为两军的联合牵线搭桥,其中一些人与中国国民党及政府要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如高崇民曾为国民党员,因反对蒋介石、从事救亡运动两次受到国民党的通缉,后来反感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毅然撕毁国民党证,退出国民党。与高崇民相反,阎宝航、王化一、王卓然都与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为开展东北救亡运动创造了许多方便条件,西安事变后不断奔走于国民党军政两界之间,竭力营救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坚决支持,也得到了东北救亡群体中的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东北军将领的认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向往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时局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崇敬之情,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爱国民主人士栗又文、阎宝航、陈先舟以及东北军中下级爱国军官高福源、解方、贾陶等人先后入党,李杜、王以哲、黄显声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成为中共的特别党员。所以,对东北救亡群体与西安事变问题的研究,涉及与东北军、西北军、国民党、共产党等几个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对东北军史、东北救亡运动史与中国共产党史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壮哉,抗日救亡群体!励精图治,收复东北。救亡图存,凝聚着救亡群体抗日复土的雄心壮志;西安事变,成就了张学良民族气节的千古绝唱。在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画卷中,东北救亡群体救亡图存的历史是一笔浓墨重彩。虽不能说力挽狂澜、扭转乾坤,但他们的救亡实践活动确实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维护西安事变的成果也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身为东北人,我为拥有这样的祖辈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重温这段历史,更加唤起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弘扬以爱国主义为主体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披肝沥胆!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东北沦陷后为收复失地的艰难探索(1931~1935)	1
第一节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最先打起东北抗日救亡的大旗	1
第二节 东北军政人员为收复东北失地的斗争	18
第三节 东北籍共产党员的抗日救亡工作	29
第二章 东北救亡群体促使张学良思想发生转变	39
第一节 歧路上的张学良	39
第二节 “核心组会议”	50
第三节 东北军爱国将领劝谏张学良联共抗日	58
第四节 东北籍共产党员为张学良指点迷津	68
第三章 东北救亡群体争取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	73
第一节 东北救亡群体齐聚西安	73
第二节 组建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82
第三节 帮助张学良改造东北军	89
第四节 做东北军将领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97
第五节 为东北军指出一条“活路”	105
第四章 东北救亡群体推动西北抗日大联合	112
第一节 策划“西北大联合”	112
第二节 为东北军与西北军的联合而奔走	120
第三节 在“艳晚事件”中	129
第四节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137

第五节 寻求苏联的支援 147

第五章 东北救亡群体在西安事变中 152

第一节 提出“扣蒋”建议 152

第二节 参与“临潼扣蒋” 160

第三节 对西安事变的因应 167

第四节 以群众运动拥护西安事变 174

第五节 成立图存学会 180

第六章 为了西安事变的善后解决 186

第一节 联络地方实力派 186

第二节 支持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95

第三节 东北军少壮派发动“二二事件” 203

第四节 处理西北的善后问题 210

第七章 东北救亡群体积极营救张学良 221

第一节 《张学良到底是个怎样人》 221

第二节 核心组成员为营救张学良而奔走 227

第三节 “东总”支持张学思、黄显声开展营救工作 235

第四节 东北军政人员的营救斗争 242

参考文献 252

后 记 259

第一章

东北沦陷后为收复失地的艰难探索(1931~1935)

东北沦陷后,以东北军为主体的东北各阶层民众流亡关内,其流亡大军达30万之众。他们饱受背井离乡之苦,一致要求复土还乡,打回老家去,率先在全国举起了抗日救亡的大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东北救亡运动。在开展东北救亡运动的过程中,东北救亡群体孕育而生了。这不仅包括张学良身边的幕僚、核心组成员杜重远、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等人,还包括东北军将领马占山、王以哲、李杜、黄显声、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东北军元老派和少壮派。同时,东北籍共产党员刘澜波、孙达生、张希尧、于毅夫等人也加入其中。虽然政治信仰、身份地位各异,但他们基于强烈的复土还乡意识,各自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尝试,共同为收复东北失地而奋斗,成为活跃在中国军政两界的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

第一节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最先打起东北抗日救亡的大旗

张学良核心组成员^①是指杜重远、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等

① “张学良的核心组”在史学上并没有特别明确的表述。在《高崇民传》中记载,“张学良因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领导层成分复杂,没有一个核心,于是指定10人组成核心,计有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其重大事宜一般先由核心组讨论,然后向张将军报告,再提交救国会的执委会或常委会讨论”(丘琴、白竟凡、高凌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53页)。虽然确定10人为核心组,但杜重远、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6人为核心组中的“核心”。因为他们一直追随张学良,是张学良的幕僚好友,为张学良执掌和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开展“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东北救亡运动,关注东北军的发展,为张学良指明前进的方向,促使其思想发生转变。故张学良将其6人作为自己的核心组成员,参与重大决策,是其西安事变期间的重要智囊团。

东北籍爱国人士。他们是东北救亡运动的发起人与组织者,是张学良最知心的朋友和高级幕僚。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他们就宣传资产阶级进步思想,要求建设东北,注重教育,发展民族工业,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东北掀起东北救亡运动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为实现收复东北,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他们在张学良支持下,组建了东北抗日救亡团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将流亡的东北民众组织起来,开展以“收复东北失地,打回老家去”为宗旨的东北救亡运动。张学良下野出国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取缔。但他们仍矢志不渝,秘密组建了抗日的复东会,继续开展救亡斗争。他们利用在社会上的威望与地位,同社会各界广泛联系,使东北救亡运动有效地开展起来。

早在20世纪20年代,杜重远、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高崇民6人就成为张学良的智囊团。他们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群体,源于他们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共同的救国理想。除高崇民一人毕业于奉天省农林学堂外,杜重远、卢广绩、阎宝航、王卓然、王化一都先后毕业于奉天的最高学府——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在学生时代就已相识。在学校期间,受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接受了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各种爱国学生运动,拯救东北危亡的共同理想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情。毕业后,他们大都留学海外。如杜重远于1917~1923年在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陶瓷;王卓然于1923~1928年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阎宝航于1925~1929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学社会学;高崇民于1914年~1919年进入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他们都受过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文化的熏陶,归国后为东北带来了新的思想与先进技术,希望在东北进行全面的改革,成为东北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和张学良相识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YMCA)。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7年,虽信奉基督教,但以社会服务为宗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会员不分教派,信不信教者皆可参加,故吸引了社会上许多爱国青年和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少帅张学良及一些国外人士。许多进步组织,如“星期三会”^①、“共产主义研究小

① 1921年前后,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中心,阎宝航为首的爱国青年逐渐形成了“星期三会”。该会每星期三聚集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一起进行学习、讨论和讲演,漫谈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提倡民主、自由、科学等。这个组织是当时沈阳进步青年的活动中心,为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准备了条件。

组”^①、“启明学社”^②等,都以此为据点组织和开展各种社会活动。阎宝航担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王化一、王卓然、车向忱、卢广绩等人也在此做过救灾、教育、宣传等大量工作,同时与经常在这里参加活动的张学良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为张学良顺利执掌政权做出了贡献。当张学良主政后,这几人自然成为张学良最为信任的幕僚,委以重任。到1929年,他们基本是辽宁省各法团的负责人。如杜重远是辽宁省工会会长,同时兼任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王化一担任辽宁省教育会副会长兼汉卿教育基金会常务理事;王卓然为东北大学教授、张学良子女的家庭教师兼东北保安总司令部国际问题咨议;阎宝航为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卢广绩为辽宁商会副会长;高崇民为辽宁省农务会会长兼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

为唤醒东北国民的救亡意识,挽救东北危亡,阎宝航、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等人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先后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3个救亡团体。他们要求发展民族工商业,抵制日货;提倡教育救国,在东北兴起东北平民教育的热潮;缉毒销烟,两次在小河沿当众销毁日本毒品;宣传国民外交常识,帮助东北政权开展对日外交,探索东北国民外交的新途径。其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大地上掀起东北救亡斗争的序幕。张学良核心组成员自然成为日本所忌恨的人物。九一八事变之夜,日本关东军闯入东北军政机关,大肆进行搜查逮捕,并到处贴布告悬赏5000元大洋通缉捉拿他们。幸好杜重远、高崇民出差在外,王化一也因事早赴北平。阎宝航、卢广绩虽然在沈阳,但在美国人麦尔斯的帮助下,乘插有英美国旗的小汽车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皇姑屯,乘火车逃离虎口,到达北平。随后,高崇民等爱国人士也辗转到达北平。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这些东北爱国民主人士表现出对国家与民族命运极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极力帮助张学良摆脱不抵抗政策的束缚,组织东北流亡民众开展东北救亡运动。对于东北失陷,他们满腔悲愤,痛苦不已。阎宝航、高崇民分别直言面谏,质问张学良为何不抵抗,为何将东北拱

① 1923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苏子元与郭刚、高子升、吴竹邨、阎宝航等人组成“共产主义研究小组”。他们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困难》《阶级斗争到政权之路》等十几本马列主义理论著述,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从中寻找革命真理和救国救民之路。

② 1923年,高崇民、赵锄非、苏子元、梅佛光、吴竹邨等人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的学术研究机构,高崇民为社长。“启明学社”的含义是冲破社会黑暗,迎接光辉灿烂的明天。其宗旨是研究孙中山革命理论,宣传国民教育,唤起千百万民众来拯救支离破碎的中国。

手相让,阎宝航甚至与张学良发生了言语冲突。高崇民在得知张学良的苦衷后,辞去张学良秘书职务,决心“不做官,不经商,专门从事救亡工作”^①。王化一同张学良谈到东北救亡事宜,提议建立一个东北的统一救亡团体,张学良表示给予支持。之后,王化一邀请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卢广绩等人商议此事,立即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他们商定将东北的反日爱国团体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将流亡的东北同胞组织起来,共同开展东北抗日救亡运动。

在他们的积极筹划下,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在北平正式成立。在这个抗日救亡团体中,集聚了各阶层具有国家观念及国家理想主义者,有无党派爱国人士、共产党员、反帝大同盟成员、青年团员、国民党员、国民党改组派成员、青年党党员等。鉴于“救国会”领导层复杂,张学良指定“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韩奠邦、赵雨时、霍维周、孙恩元”^② 10人组成核心组,也称十人团。他们掌握着“救国会”的实际权力,大事一般先由核心组讨论,然后向张学良报告,再交“救国会”执委会或常委会讨论。阎宝航、杜重远、高崇民、卢广绩、王卓然、王化一6人为十人团中的“核心”成员,同时是“救国会”的常委,担任着领导职务。如卢广绩、高崇民为总务组的正副组长,阎宝航、杜重远为宣传组的正副组长,军事组由王化一负责^③。王卓然负责与张学良的沟通与联络。后来,三个组改称为总务部、政治部、军事部,张学良核心组成员仍然负责各部工作。张学良核心组成员实际上成为“救国会”的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

在张学良核心组成员的领导下,“救国会”号召全国人民群策群力,同舟共济,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最早在全国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帜。他们确定了“救国会”两大任务,即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与组建、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工作。为此,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工作:

其一,通过出版刊物、演讲、战地慰问等多种方式进行舆论宣传,号召民众支持义勇军抗战,共同抗日救国。霍维周、王卓然等人先后在北平出版了《救国旬刊》《覆巢》和《东北通讯》等报刊,获得了国内外各阶层人士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声

① 王连捷:《为复土还乡那一天》,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页。

② 孙恩元为奉天两级师范学校毕业生。1928年接受张学良之命筹建私立海城同泽中学,任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为“救国会”委员,东北中学的校董。他为“救国会”筹款募捐,还参加东北外交研究会,为李顿的国联调查团提供了大量资料。1932年左右到上海海关总署工作,以其工作的便利开展东北救亡工作,掩护爱国志士。

③ 丘琴、白竟凡、高凌主编:《高崇民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第53页

④ 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页。

援和支持。同时,他们还经常组织各种报告会、座谈会、亡省纪念会等,派要员到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全国各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如1931年冬到1932年春,杜重远以《生活周刊》的记者身份,走遍了重庆、汉口、长沙、九江、安庆等10余个城市,做了60多次抗日救亡内容的讲演,在社会各界反响很大。此外,1931年11月,王化一、高崇民等人率领的赴南京和上海的“东北民众救国请愿团”之影响也很深远。王化一担任请愿团的副总指挥,卢广绩、高崇民、阎宝航等9人为指挥。他们面见了汪精卫、胡汉民,还冒雨前往南京蒋介石驻地请愿,责问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在热河抗战前夕,杜重远、王化一率“救国会”的政治部、军事部人员和学生80余人,亲赴热河前线,进行战地慰问、宣传和鼓动工作。为坚定前线将领的抗战决心,杜、王二人还做了汤玉麟、孙殿英及汤的参谋长李赞廷等人的工作。最后热河抗战的失败,让他们非常痛心。

为唤起民众的救亡意识,杜重远撰文呐喊,广泛进行舆论宣传。他以反问的口吻劝谏国民:

“(一)我们每个人都遂行了中国国民的责任没有?东北是属于我们中国人全体的,到现在东北的存亡,好像是与全中国的人民无关的了,尽只有已国破家亡的义军,在那里苦干着反帝抗日的工作;(二)我们全体的同胞,有没有做前线抗日义军的后盾?没有,我们今后应该怎么样去援助那些艰难困苦的反日义勇军?”^①

杜重远希望以此来劝醒国人,都来关注和支援那些在东北浴血奋战中的东北抗日义勇军。

其二,联络与支持义勇军。针对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车向忱、宋黎、宁匡烈、黄宇宙等大批干部受“救国会”委派秘密出关,联络各地义勇军。为加强对义勇军的领导,王化一以军事部长的名义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派人出关抗日,委任抗日义勇军首领。他将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委任了各军区的总指挥,他还兼任辽南军区总指挥。为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会”还向义勇军提供大量的军事物资,先后4次派人大批量地运输,成为义勇军抗日的坚实后盾。在这些东北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到1932年3月,经“救国会”委任的抗日义勇军已达54路^②(以后增加到56路)。到1932年夏秋之际,东北抗日义勇

^① 杜重远:《悼抗日志士邓铁梅君》,1934年6月,《新生周刊》1卷35期。

^② 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东三省义民血战记》,1932年。

军已发展到40万以上,开创了若干抗日游击区,游击范围广及102个县^①。比较著名的有邓铁梅部开创的辽东三角地带抗日游击区、唐聚五部开创的东边道抗日游击区、李杜部开创的吉林下江地区抗日游击区、马占山部开创的小兴安岭及黑嫩平原抗日游击区等。他们在东北大地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精神,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其三,发动一切具有爱国意识的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为抗日义勇军筹措经费。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王卓然、车向忱等“救国会”常委大搞救亡宣传的同时,还向各地包括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内的各界人士公开开展募捐活动,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如宋庆龄、上海海关的丁贵堂等人都给予了慷慨资助。杜重远向上海工商各界及海外华侨募捐,得到了大批款项,成为支持义勇军抗日的重要资金来源。他还和上海其他爱国人士一起,为马占山抗战捐款,给抗日将士极大的援助。1932年,王卓然等人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发行“爱国奖券”,筹集抗日经费。在南京政府强令停售前,爱国奖券发售6期,特种奖券1期,净余款17万余元^②。正如王化一所言,发行爱国奖券,使“本会工作赖以支持”^③。

尤应指出的是,作为“救国会”常委的张学良核心组成员,还能在军事上的关键时刻,以其超常的战略眼光,为张学良指明出路,甚至亲自参战。在1931年底日军大举西进锦州之时,核心组成员商议,东北军一定要全力打击来犯之敌,誓死保卫锦州。1931年12月24日晚,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人觐见张学良,促其下决心抵抗。因南京政府正与广东方面发生战争,中央军不能助战,张学良陷入了“进退和战”的两难选择:“战则要东北独立支持,中央坐观成败,和则冒舆论之大不韪,遭全国唾骂或致丧失政治地位。”^④核心组成员晓以利害,劝其抵抗,早下决心。但张学良仍犹豫不决,最后致使锦州失陷。不久,日军直逼热河,热河危机。1932年1月4日,“救国会”常委会召开会议,其对策如下:

- “1. 劝促张学良率全体东北军出长城反攻,请他更换热河主席汤玉麟;
2. 发动东北义勇军配合国军反攻,各军团总指挥一律到前方去;

① 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页。

② 林长青:《东北人民抗日救国会简记》,转引自王驹、邵宇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3页。

③ 《王化一日记》,1932年12月25日,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④ 《王化一日记》,1932年12月24日,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

3. 呼吁全国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一致督促南京政府抗战。”^①

王化一受“救国会”委派去向张学良面陈建议,并将具体实施的11条方法一并交付与他。王化一向张学良举荐黄显声、王以哲、胡毓坤取代汤玉麟,以加强热河防务。张学良虽有取代汤玉麟之意,无奈大敌当前,考虑到众多因素并没有置换,未听取核心组成员的建议。不曾料想,汤玉麟却不战而逃,弃守热河。在危急时刻,王化一被张学良暂时委任为古北口警备司令,指挥东北军第7旅两个团在古北口外布防。虽然他不谙军事,但毫不畏惧,在张学良电话的传授下进行指挥,对古北口全力防御,坚持了4个昼夜。后由国民党第1师、第24师和东北军第7旅接防,才撤出阵地。王化一已经超出了张学良幕僚的文职身份,亲自投身战场,指挥战斗。王到北平汇报时,张学良将自己用的左轮手枪赠予他,以示慰劳。王化一后来又赴古北口,负责援助抗日军队,收容热河的抗日义勇军等。由于连夜奔波,身患重病,于昏迷中被送到北平医院。为了东北抗日救亡事业,核心组成员可谓殚精竭虑,死而后已,真是可歌可泣。

“救国会”的许多重大事宜,都是核心组成员同张学良探讨后,在张学良的默许与支持下开展的。但是,张学良下野出国后,“救国会”便失去了张学良的有力支持,处境十分艰难。

“救国会”开展的抗日斗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也给他们的侵略造成了极大阻碍。《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逼迫国民党当局取缔一切抗日活动。国民党当局为避免与日本开战,一面对日本妥协退让,另一面对抗日民众实施镇压,取缔一切抗日组织。“救国会”的军事部副部长霍维周被杀害,执委张希尧等人因宣传抗日遭逮捕,“救国会”被查抄,该会赖以生存的“爱国奖券”被停止发行……“救国会”陷于困境。为保存这个抗日救亡组织,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钱公来4名代表与何应钦进行交涉,遭拒。1933年7月31日,在“救国会”的最后一次常委会上,他们决定:

“1. 不仅不停止活动,更应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2. 缩小组织,裁汰不必要人员更求精练;3. 为避免磨搓,此后转入秘密行动。”^②

大会推选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等人为工作拟一具体方案,同时宣

① 王化一:《日寇侵热期间热河纪行》,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第53页。

② 《王化一日记》,1933年7月31日,未刊稿,辽宁社会科学院党史所资料室存。